

运用“跨国史”概念研究抗日战争

入江昭

世界只有一个,所以人类历史也只有一个。所谓历史,本来是整个世界或全体人类的记录。然而,以特定国家为核心的历史仍在被不断书写出来。此无他,不过是曾经任何事都以国家为核心的时代的残影而已。不妨说,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。因此,面对现在的世界,依然只谈论以国家为核心的历史,不仅会再次拉大国家间的知识差距,而且也是对国家这一集合体以外的众多要素的轻视甚至无视。

对人的行为起规定作用的要素,除国家外还有许多,比如,通过宗教、性别、年龄、阶层或者健康状况等来理解某一类群体,也并非不可能。这些要素中,很难说哪一个是最重要的。尽管如此,提到历史,人们总是按国家来把握,如日本史、美国史、中国史等。何以如此?

在过去的约60年中,我一直在美国学习历史、发表研究论文,其基本框架直到最近也是“国家”。本科毕业论文是《18世纪英国的神职人员》,到了研究生院,博士论文是《1920年代末期的美、中、日关系》,研究对象都是特定国家,或特定国家间的关系,或曰国际关系。

如“国际”(international)一词所示,国家这一单位在综观世界整体时也被置于核心位置。至少在18世纪主权国家出现于欧美之后,人们运用“国家”(nation)或“国际”(international)的框架来把握历史就已成为理所当然。但是,仅通过此类现象思考过去,只能使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获得十分有限的理解。

人类行为的政治侧面被过分放大,或是国家这一框架如此流行的原因。假如研究的出发点是思考人们如何形成政治群体、如何区分自我和他人,则面对近现代史,当然不得不关注各种政治现象。但是,在20世纪后半期,尤其是60年代至70年代,如下观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:即使在一个国家之内,除政治外,也还形成有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许多关系,探求人们形成此类关系的过程,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其结果,女性史、人种关系史等研究日趋活跃。

最近欧美的历史研究及历史著作的特点之一是,以整个世界为背景——而非按国别——来对上述各种关系作社会史分析和把握。这也可称之为社会史全球化。该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后日趋明确,无非是实际现象全球化的反映。

这20年左右,“世界史”(world history)被越来越多地称为“全球史”(global history)。世界史和全球史有何不同?从根本上讲,前者试图把世界上所有国家、地区都包括在内,而后者则更重视跨越国境的关系。极而言之,后者并不看重国家单位,所重视的是人与人相互接触、交流的过程。在这个意义上看,人们越来越喜好使用“跨国史”(transnational history)而不再使用“国际关系史”(international history),也就容易理解了。所谓“跨国史”,归根结底并不重视甚或有意无视国界的存在,旨在描述的是人与人的自由交往或思想、艺术、学术等超越国界而相互融合的情状。

现在中国和日本的关系,似也应作为跨国现象——而非应用从前的国际关系框架——来把握。若把焦点对向生活于世界的中国人、日本人之间的联系,则自应有不同于政府和政党立场的、以人为中心的视野出现在眼前。

我作为与任何政府、国家都没有关系的个人,一直作为教师、历史研究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——尤其是年轻人——进行交往。在此过程中,我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带有包容性、开

放性甚至普遍性的,较之变幻无常的国家关系属于完全不同层次。(最近在美国老年人公寓和80多岁、90多岁的人交流机会较多,在这里,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国籍或人种等,而是年龄、世代)

我在教育、学术界所接触的中国人,无不优秀、勤奋、正直而富有同情心。当然,其他国家的学生、学者也如此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较之如此优秀而饱含激情的中国人以世界为舞台追求知识,日本的学生、学者的影响却相对较小。

但是我想,即使这样也很好。对现代世界最为重要的是,在困扰人类的各种问题上——尤其是在环境、人权等方面,人类能否超越国境而携手面对。过去,日本曾破坏过中国的自然环境,蹂躏过中国的人权,但所幸近年来在保护环境、守护人权方面已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。中国人和日本人如果在这些方面能够携手合作,那不仅对两国关系,对全世界人类的福祉也是极其值得高兴的。

[作者入江昭,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;译者袁广泉,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]

(责任编辑:高莹莹)

关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几个问题

久保亨

对于日中战争史研究,本人最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,日中两国历史学者应该注意到,两国人民的历史认识有很大的差异。

日中战争的战场在中国,而不在日本。因为日本军队来到中国,荼毒中国的城市和农村,杀伤中国人民,掠夺物资,所以中国人民当然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。

与此相反,日本人民的加害者意识不强。发生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理由:1. 因为战场不在日本国内,所以一般日本人几乎没有机会目睹日本军队对于中国的加害行为。2. 因为日本政府与军部对战时报道的控制非常严密,大部分的日本人,在战争终结以前对此并不了解,对侵略实情缺乏认识。例如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,日本国内完全没有报道。3. 因为战后中国处于混乱之中,战争结束后并没有马上公布战争受害的全貌(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)。4. 冷战开始以后,美国基于它的世界战略,优先复兴日本,日本的对华战后赔偿中断了(20世纪五六十年代)。5. 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的时候,本来应该讨论中国的战争被害和日本的战后赔偿问题,但是因为那时日中两国各有复杂的内情,有关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处理(20世纪70年代)。在以上诸种历史因素影响之下,日本人的加害者意识一直不强。

两国历史学者必须注意,日中人民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,有不容易克服的差异,应该通过今后的历史研究,一步一步努力消除这些差异。